

汉字人文精神论

昔 唐 禹 舜 尧

后 羿 皋 陶 皋 陶

禹 舜 尧 禹 舜 尧

效 舜 禹 尧 禹 舜 尧



• 江西教育出版社 •

汉字文化丛书 · 申小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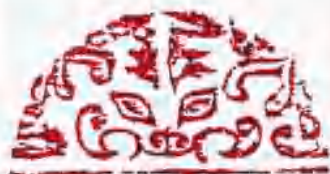
汉字文化丛书

汉字人文精神论

申小龙 著 · 陈海洋 主编 · 江西教育出版社



00277719



(赣)新登字第 002 号

书 名: 汉字人文精神论
作 者: 申小龙 著
出版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75
定 价: 11.30 元
书 号: ISBN7-5392-2295-6/G·2154

邮政编码: 330003

(赣教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汉字的人文性，或者说人文精神，是当代汉语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一般说来，文字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因为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符号的符号，是记录语言的工具。除了字形之外，它的其他内容都是语言的内容，包括字音、字义、字能（组合功能），还有书面语的组织形态。这种对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源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①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齟齬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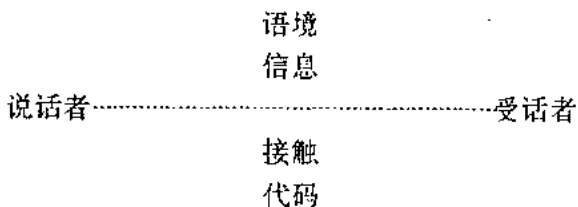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等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

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①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

^① 参见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7-359页。

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

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我想，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

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 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 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 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里，我愿意引用两位西方语言学家的共同意见：L. R. 帕默尔说：“高本汉说得好：‘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的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①

汉字的人文精神，不仅在于汉字本身“形入心通”的特质，更在于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意系统，汉字的结构体现出汉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因而汉字具有独立的文化解读功能。汉字是一种以象

^①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9页

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文字。虽说一般的文字系统都经过象形的阶段，但象形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只有在汉字中基本保留了下来，从而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的阐释提供了系统的依据。中国古代的小学就是以汉字的形式和意义的分析为中心，对经典进行文化阐释的。而小学的汉字系统，就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世界。正如金克木所说：“《说文解字》的符号世界是汉朝人在公元前后一段时期的宇宙观（世界秩序），这是一个封闭系统。始‘一’终‘亥’，是‘立一为端。……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从‘一’（元、天）、‘上’（下）、‘示’（神）、‘三’（‘天、地、人’、王）开始，到‘二’、‘土’等而归结到数（从‘四’到‘九’）‘兽’、干（甲……癸）、支（子……亥）。十千分指东、南、中、西、北，又指四季；十二支分指十二个月。最后说是‘亥而生子，复从一起。’这个分部排列次序传达了汉朝人认识世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完整的宇宙观体系，将整个宇宙排列成一个封闭的有秩序的自我循环的结构。这个符号系统是一个符号世界，反映了一个现实世界，更是表现一个‘文化’世界，也显示了汉代人对自己创造的符号（文字）的态度，即符号学的所谓‘认识论’（用哲学术语而含义不同）。……古时人总是认为文字符号全体即代表宇宙事物全体（以语言文字表现对宇宙的认识），符号秩序和宇宙秩序有密切关系（符号是万物的象征）。”^①

不仅是符号秩序，即使是汉字符号本身，其字形的分析诠释也可以用来表达深湛的思想。《易》曰：“兑者，说（悦）也”；《论语》曰：“政者，正也”；《礼记》曰：“仁者，人也”；《左传》曰：“止戈为武”；《韩非子》曰：“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姜亮夫《古文字学》云：“整个汉字的精

^① 金克木《艺术科学谈丛》，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8页

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故表声以葢，以箫管（即𦏧），表闻以耳（听、闻、聪等），表高为上视，表低为下视，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①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的人文精神的研究，是汉字字形、字义、字音、字能的综合研究。它包含着当代汉字学对汉字性质的反思，也包含着当代汉字研究对书面语言特质的反思。从根本上说，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本源。声音符号和视觉符号因其各自不同的功能而共同承担人类交际、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用。文字因其图象性而具备的突破时空局限的能力，是口语无法替代的。即使是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也必定有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正如陈望道所说：“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②事实上，无论从心理学还是生理学的角度看，人类最初的视觉符号比听觉符号更接近所要表达的东西。一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手势语与口语同时发生，甚至发生得更早些。至少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说听觉符号早于视觉符号，也看不出这种说法的必然性。“口语的威望”并不能建立在贬抑“文字的威望”的基础上。

① 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② 陈望道《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载《立达季刊》1925年第1卷第1期

本书对汉字的人文精神的研究从七个方面展开：(1) 汉字形态的文化特质及其演变；(2) 汉字构形的文化历史解读；(3) 汉字建构的民族文化心理；(4) 汉字的文化传播功能；(5) 汉字研究传统的文化阐释；(6) 对汉字改革的文化反思；(7) 与汉字的人文性同出一源的汉语的人文性。这七个方面的研究仅仅是一种尝试，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在汉字文化研究上的新成果，让古老的汉字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巨大的功能，焕发夺目的异彩！

复旦大学教授 申小龙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目 录

第一章	汉字的文化形态	1
第一节	汉字的文化功能与形态渊源	1
第二节	汉字文化形态的演变	8
第二章	汉字的历史解读(上)	17
第一节	汉字与社会形态	18
第二节	汉字与社会制度	21
第三节	汉字与社会生产方式	25
第四节	汉字与社会生活方式	32
第三章	汉字的历史解读(中)	36
第一节	汉字与原始手工业	36
第二节	汉字与古代科技	39
第三节	汉字与古代风俗	42
第四节	汉字与古代战争	44
第四章	汉字的历史解读(下)	47
第一节	汉字与原始艺术	47
第二节	汉字与原始意识	51
第三节	汉字与原始宗教	53

第一章 汉字的文化形态

第一节 汉字的文化功能与形态渊源

如果对人类各民族的文字形式作一个二元区分的话，那么在—端的是表音文字，在另一端的是表意文字。这两类文字都能够忠实地记录语言，帮助语言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使之授之异地，传之异时。然而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这两类文字的文化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把印欧系形态语言和拼音文字的关系，经典地解释为一个人的相貌和他的照片的关系。他认为，表音文字的目的仅仅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这种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仅仅在于表现语言，因而它只是口语的记录工具，是语言符号的符号。与此相对照，索绪尔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的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这样看来，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直接体现着民族

文化的全部蕴涵，它们不仅作为“第二语言”而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而且由于它们独特物质形式，它们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阐释中起着表音文字难以企及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是人类文明的有力杠杆。正如《英国大百科全书》（1964年版）在“文明和文化”条中所说，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语言文字，文明甚至不会出现，而且肯定永远不会达到它的高级形式。西方的第四福音书开宗明义就认为：“一开始，就有文字；……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文字制造的；……生命存在于文字之中，生命是人类之光。”歌德宣布说，一开始就有行为，而语言学家认为文字一直就是行为，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对文明做出新的解说。文字是创造奇迹的行为，它创造了许多脱离了文字就不能存在的东西。正如十八世纪一位牧师所谈到的：“文字有一些神秘莫测的力量。这使它们产生了一种超出我们通常能解释的力量。”欢乐和无穷的悲哀随着文字而来。文明中主要的感情成分——人类生活中非常尖锐和独特的成分就是主要由文字组成的，它们可以建立敏感的、激动的新境界。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记忆力的清晰度，同时还活跃了我们的想象力。如果没有文字，则想象不可能广泛存在。用这些文字创造的词汇，使我们能详尽表达和发挥我们的希望、害怕、顾忌、沾沾自喜、嫉妒、悔恨和报复等心境，这远远超过了在旁观者看来是合理的程度。我们用文字可以回顾过去还可以展望未来。用文字建造的宫殿能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能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恐怖。《英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字的这些礼赞，虽然从语言学的角度说还不够科学，但它确实道出了文字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这种巨大作用中，我们尤为关注的是表意文字的文化功能，尤其是赖以实现其功能的表意文字的

文化形态。因为这种文字形态能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直接反映思维的内部语言代码，而无须通过语音的间隔带。

任何一种表意文字，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其结构形态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学者们曾经将这一过程附会于一个美丽的神话。《淮南子·精神篇》作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描述：“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据高诱的解释：“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弃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这样一位传说中的汉字之父，《春秋元命苞》的记载更为具体：“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在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汉民族寄托了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礼赞和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文字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犹如在人类的双目之上又增添了一对眼睛，可以鉴往知来，观照四方，并修养睿德，使鬼魅无所遁身。从先秦老庄的哲学来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语言往往成为人类传递虚假信息工具。这是一种文明的代价。尤其在文字产生以后，更容易在文明进化中伴随“诈伪萌生”。然而文字毕竟是人类发展的巨大动力。“天”都会为之“雨粟”，因为文字使人类的经验得以积累传承，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惊天地，泣鬼神。

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汉民族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从而使汉字的创造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汉字文化形态的形成过程。所谓“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实际上是一个观物取象的过程。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

物”，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到了黄帝的时代，“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其方式是“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说文解字叙》）汉字“观物取象”的结构化过程可以从汉字身前的图画文字看出来。

例如在远古时期我国西北河湟地带居住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在那里形成了纳西民族。纳西族书写他们的经书所用的文字——东巴文字，也是一种表意文字。董作宾在《么些（纳西）象形文字字典序》中认为，纳西东巴文字与汉民族的古文字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前者是文字演变过程中的童年，后者已是少年。马叙伦也认为，纳西族文字“几乎可说是汉文的前身。”^①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羌”的记录，说明羌族与汉族在上古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汉语和纳西语都有声调，都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都以词序和助词表达语法意义，同属汉藏语系，我们从纳西文字的特点可以看出汉字由图画文字衍变的一些原始轨迹。

纳西文字的象形方式丰富多样，无论是太阳、月亮、动物、植物，都能“随体诘屈”，取象构形。尤其它还能从一个字形的各种变易分化出一连串与之相关的字形。例如“人”字形稍作变易就可以表示“立”、“坐”、“伏”、“舞”、“走”、“跑”、“跳”、“左”、“右”等。“水”字一剖为二就分别表示“北”和“南”。（纳西族所居的滇藏高原，水流自北而南。）“日”字的圆环中心缺一点表示“日无光”，边上缺一点表示“日蚀”。“刀”字像一把匕首，略作曲折即为“刀折断”。“树”字曲折则表示“树折”或“折断”。“山腰”字略加删削即为“山脚”。“水尾”字略加延长即为“水之

① 马叙伦《中国文字之源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载《马叙伦学术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